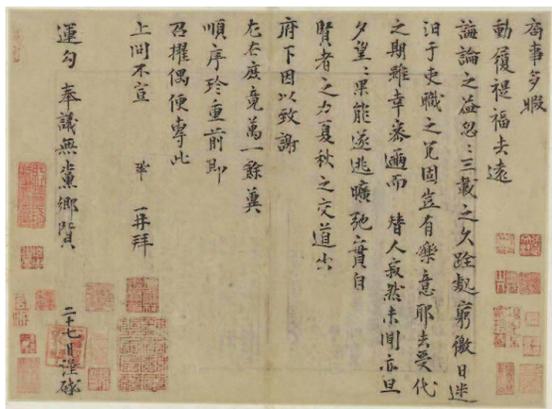


曾巩《局事帖》二题

虞云国



局事多暇，动履褻福。去远海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跼处穷微，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事耶？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迹，而替人寂然未闻，亦且夕望。果能逃遁旷地，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 巩 再拜

巩同属旧党的彭汝砺（1047—1095），在其《鄱阳集》卷10有《寄题晏无党少府》诗，宋代常以少府借称县尉，元丰改制后也指“判少府监”。这位晏无党少府与王安石出访、曾巩致书的对象很有可能是同一人。笔者推测，北宋仁宗朝宰相晏殊与王安石同为抚州临川人，这位无党也许即出自临川晏氏，故王安石与谈归乡问题。

查弘治《抚州府志》卷18《科第一》，嘉祐四年（1059）刘焯榜下有进士晏朋，注云：“（晏）殊从侄孙，临川县人（清雍正《江西通志》卷49《选举》同）。中国古人称呼有名有字，一般来说，字是男子及冠之年才据名而取的。据《太平御览》卷362引《秦记》说：“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礼，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文献学研究指出，在据名取字的传统中，“名与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其原则“有的名与字是同义词”“有的名与字是反义词”（参见王力《古代文化常识》）。而“朋”与“无党”恰构成“名与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属于取字传统中的反义词原则，也即宋人所谓的“有因其名之美而抑之者，有因其质之偏而矫之者”（俞德邻《左近仁字说》）。类似的例证在南宋梁克家编纂的《淳熙三山志》卷29《人物类四》中也有“黄朋举，字无党”的记载，故可推断这位晏朋即字无党。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8元丰七年九月庚申条云：“转运司管勾文字、奉议郎晏朋，宣德郎王惟各罚铜斤，坐不应副麟、府州赏功绢也。”这位晏朋罚铜时任转运司管勾文字，其差遣实职的简称与《局事帖》里无党乡贤出任的“运勾”正相契合，奉议郎的阶官也与《局事帖》里“奉议无党乡贤”如合符契。《局事帖》作于元丰三年，罚铜时在元丰七

年，晏朋的差遣与阶官或在同一考课磨勘周期内，故未有变动。由此足以断定，这位罚铜的晏朋就是弘治《抚州府志》里那位晏殊的从侄孙、嘉祐四年的临川县进士；他与上文王安石出访的“无党”与彭汝砺寄题的“晏无党”都是同一人。曾巩虽是建昌军南丰人，但建昌军在唐代与五代前期都属抚州治下，直到元初，吴澄尽管籍贯是抚州崇仁，跋曾氏墨帖落款时仍敬书“乡后学”，故曾巩称临川人晏无党为乡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作帖月份之再考

2016年，尹光华先生著文《千年遗珍人间孤本：曾巩〈局事帖〉初考》（下称《局事帖初考》），其中多有胜义。他以《局事帖》已经以元丰改制的阶官衔称无党，坐实其只能形成在元丰三年（1080）九月十六日颁行元丰官制后，极具说服力。但进而认为：

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赐对延和殿”，并结束了外放生涯。因此，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十月间。由于信末已写明“二十七日谨启”。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

李震在《曾巩年谱》修订版中即采此说。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或许未能言必。之所以有此异议，关键在于对以下帖文的不同解读。先列《局事帖初考》理解的引文：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

笔者则将这段文字点读如下：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

也就是说，《局事帖初考》以为“前即召擢”是说，我却认为是曾巩。

曾巩自熙宁二年（1069）与王安石政见有异，便自请外放，其后十二年间历知六州，转徙南北。熙宁十年（1077）起，曾巩以“母老多病，见居京师”为由，一再恳求朝廷“或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曾巩集》卷16《福州上执政书》），却未能如愿，仅依次从福州易明州改亳州而已，连《宋史》本传都说当时舆论“颇谓偃蹇不偶”。不料元丰三年（1080），曾巩新接移知沧州的任命，比起亳州来，这将意味他离寓食东京的八旬老母更加遥远。百般无奈下，他在往赴沧州转道抵京前向皇帝上状，要求面见宋神宗。他一再强调自己“远违班列十有二年”“窃不自揆，愿奉德音”“伏望圣慈，许臣朝见”（卷34《按沧州乞朝见状》），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伏蒙圣恩，赐对延和殿”，恩准他留京任职，勾当三班院，结束了长达十二年颠簸外放的经历。《局事帖初考》推断《局事帖》作于九月二十七日，恰是曾巩等待德音前途未卜之时，揆之情理，作帖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倘将“余冀顺序珍重”属上读断，则可理解为：夏秋之交，我经过府上，乘此机密致谢左右，或略表感激之情于万一，其他希冀你逐次珍重。而“前即召擢”若依《局事帖初考》则属上读，乃曾巩祝愿元丰之“窃不自揆，愿奉德音”与资格的限制，这种空口祈祝反显得有违情理。相反，“前即召擢”若作下读，则是曾巩在前途明朗后通报无党之语；我前不久已受皇帝召擢，让我留京，偶有方便，专作此帖奉告。倘按此理解，《局事帖》应作于十月二十六日赐对延和殿之后，而少有可能作于去留未定忐忑等候的九月二十七日。

在赐对延和殿不久，曾巩再上状要求登对，此即《曾巩集》卷34《乞登对状》所云“伏望特垂圣慈，许臣入殿博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称前日之圣问”。中华书局本在此状下据《南丰曾先生文集》有校记云：“元丰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进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元丰三年十一月壬子（即二十四日），即载有曾巩登对的详细内容（其内容包括《曾巩集》卷30《请令州县特举士劄子》《议经费劄子》与卷31《再议经费劄子》）。也就是说，曾巩在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还要赶写以上状劄，而《局事帖》又未向无党提及登对事，故有理由推断：《局事帖》作于延和殿赐对次日，即十月二十七日，曾巩就迫不及待将赐对召擢奉告对方，并诚挚表达由衷的谢意。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学林

章太炎的忧患与艰贞

孟琢

2023年，章太炎先生的嫡孙章念驰先生将自己收藏的最后一批珍贵文物，捐赠给了余杭市章太炎故居。这不是这位老人的第一次捐赠。在章太炎身后，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手稿、信札、书法、图书、碑帖，其中不乏国家一级、二级文物。这批重要的历史遗产，经由章念驰与章氏后人的数次捐赠，保存在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和余杭章太炎故居两地。在这批新捐赠的文物中，有一幅章太炎先生手书的大字——“子其艰贞”，格外引人瞩目。

初见这四个字，便让人震撼不已。章太炎长于篆书，但很少有榜书之作，这幅字却是例外。每字在一百三十厘米左右，运笔厚重，结体端严，齐整的篆书中蕴含雄放之势，颇有湖海岳峙之感。就文字而言，这四个字亦有些难认——前三字为《说文》籀文的写法，“贞”则为周代金文的写法。章太炎是“小学”巨擘，善用古字，对此自然信手拈来。他选用笔画繁复的字形，一则便于榜书结体，二则更为古雅美观，但对今人来说，却难免有些陌生。

何谓“子其艰贞”？它典出《周易·明夷》：“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夷是艰难中的一卦，其象“离下坤上”，离卦喻指太阳，坤卦喻指大地，太阳沉落在大地之下，正是漫漫黑夜的开始，也就是所谓“晦其明也”。暗夜之中，君子的立身之道在于“能正其志”。贞者，正也；贞者，定也。守正不移、坚定无悔，体现出艰难困苦中的坚韧操守。中国古人多以“明夷”指称忧患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便是典型之例。《周易·系辞》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是一种深沉的责任，一种自觉的担当，“艰贞”正是忧患精神的体现。

“艰贞”是在忧患中坚守正道，“子其”中的“子”指的是谁呢？是章太炎的妻子自道？还是对后人的劝勉期待？我们认为，二者当兼而有之。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说：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挈光复，未尝废学。东国佛藏易致，购得读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学音韵，遍览清世大师著纂，犹谓未至。久乃专读大徐原本，日翻数字，至十余周。以《说解》正文比校，疑义冰释。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又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楹书》亦多所修治矣。

这段自述可谓章太炎的学术总结。在他看来，自己治学虽得益于朴学传承、师友探讨，但“忧患”始终是学术思想的根本动力。忧患有大小之别，自大处而言，风雨飘摇、苦难交加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忧患；自小处而言，七被追捕、三人牢狱的革命生涯，是章太炎自身的忧患。他的学术研究思想探求，在国家和个人共同的“艰”难之际，展现出坚“贞”守正的铮铮风骨。

章太炎的学术以“小学”为根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容易陷入僵死琐屑，清末以来，繁琐的考据之风日盛一日。章太炎的“小学”则一反旧道，注重语言文字体系与科学学理的建构，正如黄侃所言，这是一种“系统条理”的学术境界。在《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这“小学三书”中，章太炎建构起贯穿汉语汉字源流演变的语言文字系统，让他的“小学”超越前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的奠基。

在“小学”背后，更是章太炎深沉博大的文化忧患，让语言文字具有了革命性的精神内涵。在1906年的《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他大声疾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语言文字是“国粹”的根基，深入理解汉语汉字的系统与优美，自然能激发“爱国保种的力量”。想要灭国亡种，也先要改易其语文。因此，面对《新世纪》杂志鼓吹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的观点，章太炎与之展开激烈论战：“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性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

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在“小学”的深湛研究中，蕴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责任与深情。章太炎的思想以“玄学”致广大。在《齐物论释》《国故论衡》《蕪汉微言》等著作中，他将庄学、唯识学、华严学结合为一，建立起以“自在平等”为主旨的哲学体系。齐物哲学素来难解，但倘进入章太炎哲学的深处，也能看到其中鲜明的忧患意识。他化用《系辞》之语，概括《齐物论》的思想特点，“论作者，其有忧患乎？”齐物哲学的忧患是双重意义上的，一方面是对列强侵略下中国现代命运的忧患，通过对“文明论”的彻底反思，走向民族的自由独立。一方面是对全人类的被压迫、束缚的历史命运的忧患。“苟专以灭度众生为念，而忘中涂恫怨之情，何翅河清之难俟，陵谷变迁之不可预期，虽抱大悲，犹未适于民意。夫齐物者以百姓心为心，故究极在此，而乐行在彼。”在章太炎看来，无论多么高妙精深的哲学思考，如果忘却了人类当下的苦难——“中涂恫怨之情”，终究不是第一义的。因此，齐物哲学的真谛考索与俗谛关怀密不可分，都指向了“以百姓心为心”，指向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建立。在章太炎的哲学思考中蕴含浓郁的悲悯之心，这种悲悯关乎中国的现代命运，也关乎人类根本性的存在处境。

无论“小学”还是哲学，忧患意识都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内在动力。这种忧患是民族性的，也是普遍性的，让他的思想世界具有了全面的现实关切。正因如此，“子其艰贞”可以理解为章太炎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纵览其生平，从清末革命到日寇侵华，他始终生活在动荡而忧患的时

代，但正是这样的“艰”难历史，为他的学术思想赋予了坚“贞”不渝的底色。当然，“子其艰贞”也是章太炎对后来者的期许。这一期许既是学术上的，也是人格上的。1935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章太炎反复提倡《春秋》大义：“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有虞，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地，磅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在经学讲习中激发磅礴的爱国之心，这正是国家忧患中最根本的守正之道。1936年，章太炎溘然长逝，在遗嘱中说道：“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人官尤须谨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叮嘱后人的首要之事，便是一旦国家不幸，“异族入主”，必当洁身自持。也许，“子其艰贞”这幅晚年巨书，正是他留给后人的期许与嘱托。

令人敬佩的是，在章念驰先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份“艰贞”气象。虽为名人之后，但在特殊的历史中，这个身份并不轻松。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年少时读书的艰难，也记下了传承、弘扬章太炎学术的重担——无论是对章太炎文选的编纂，还是对章太炎研究的推进，章念驰先生都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学者。这份成就并非源自“出身”加持，更源自他一生孜孜不倦的努力。作为章氏后人，他不敢苟且，无私捐献，充分诠释了章太炎《遗嘱》中“立身为贵”一语。在最近的这次捐赠中，他提出了“以捐助研”的新理念，通过余杭政府设立奖金，支持《章太炎研究》集刊及相关学术会议，推动“章学”的不断发展。他特别强调，希望自己的捐赠不仅是还在故居“藏”起来，更能为广大学者研究所用，更可谓苦心孤诣。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代代相传，“艰贞”的人文精神亦传承不已。我们虽远离了“艰”的时代，但在顺境中自我贞定？这也是对当代学人的新考验。无论如何，坚持学术的求真与广大，把握学术背后的时代关切与历史责任，摆脱功利和私欲对学术公心的干扰，都是“子其艰贞”带给我们的启迪。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



“2001年9月12日，世界上所有作家在书桌边坐了几个小时，都不情愿地起了换职业的想法。”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等作家都表示，他们在袭击发生后一度经历失语。个中缘由，想必除了恐怖袭击的极端性和残忍性外，还有图像媒介摄人心魄的表征能力。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著名作家选择直面恐怖袭击，用文字去对抗图像，探求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叙事形式，于是，一个叫做“9·11文学”的亚文类应运而生。这些虚构叙事或直接间接地言说恐怖袭击，以艺术自身的价值参与话语生产。回过头来看，在过去二十年间，9·11事件不仅让小说家们极力寻找新的表征形式，也让众多学者认真反思起了“文学之用”。

但汉松新著《跨越“归零地”——21世纪美国小说研究》正是这样一部以“9·11文学”为主题的文学批评论著。作者并未如传统做法那样径直做断代研究，而是主张在奥斯维辛、广岛长崎、德累斯顿等地发生的暴力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连续体中，审视9·11事件及其文学叙事。在梳理文学与恐怖、“9·11小说”与大屠杀文学等相关学术概念的深层联系的基础上，作者重点围绕创伤、共同体、他者伦理、暴力、共情、战争书写等核心话题，深入考察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弗尔的《特别奇》、弗常近》、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等经典“9·11小说”，分析它们如何编织异于美国主流社会的仇恨与进攻主义政治的反叙事，并以批判性视角介入9·11事件的话语生产中。他创新性地将“9·11小说”定位在西方文学的恐怖与暴力这一传统中加以解读，也深入挖掘其丰富多元的当代维度。

由于“9·11文学”出现的时间尚短，许多问题依然处于探索的初期，但汉松在书中提出了借用大屠杀文学丰富的批评资源来烛照这一新型亚文类的构想。纳粹屠犹事件的规模与伤亡程度远非9·11恐怖袭击能比，但撇开各自的历史语境和发生原因不论，它们作为历史上的极端暴力事件，在文学是否可见证、应该如何见证、如何反思共同体等问题上确实能构成类比与参考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归零地”》一书力图与著名文学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的著作《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2011）展开一场对话。

不论是集中营的毒气室，还是燃烧着的双子塔，其恐怖程度都远超普通人的想象。米勒坚持认为，尽管这些极端暴力拒绝阐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文学的见证力，在指认暴行的真实性的同时，也要从记忆走向行动。

在研究大屠杀文学时，米勒并未将关注重点全部放在如《辛德瑞拉名单》《黑犬》《民族》等“正统”作品上，而是绘制了一幅更为宏大的景象：卡夫卡的《审判》《下落不明的人》《城堡》等虚构叙事在暴行发生前就不可思议地预见到了屠犹现场和共同体的焚毁，并用延迟到达、抵制阐释等技巧呈现出文学见证极端恐怖的几种艺术形式。他接着在分析四部大屠杀小说时将复杂的见证问题与小说的叙事风格等结合起来，抛出了“作家越接近直接见证，他的文体和叙事就变得越精妙复杂”的奇思妙论。最后，米勒又转向聚焦奴隶制历史的后现代小说《宽儿》，以此打通大屠杀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如此一来，奴隶制、屠犹事件、虐囚案等等发生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极端暴力事件得以相互映照，奴隶制时期的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9·11后的当前社会就被勾连了起来，而“大屠杀到所有关注有尊严的人被降格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义上的“赤裸生命”这一极端恐怖状况的文学叙事。

同样，汉松也试图为严肃意义上的“9·11小说”松绑。它一方面指向“归零地小说”，包括个体的创伤体验、帝国边缘的他者因恐惧而反思文化身份等叙事，同时又超越了归零地，将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利比》和康拉德的《间谍》也囊括进来。麦尔维尔的故事讲述的是19世纪中叶华尔街一位“非暴力不合作者”巴特利比以语言为武器对美国文化在象征意义上的“双子塔”——清教伦理与资本理性发起的一场悲壮攻击，而康拉德出版于20世纪初的小说展现的则是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大英帝国政治之间的复杂较量。

作者称它们为“前9·11小说”，倒不是因为它们如米勒的“前大屠杀文学”一样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即将发生之事，而是在于它们有着与“9·11小说”相似的叙事主旨：文明与恐怖的相伴相生，帝国边缘的他者对权力中心发起攻击和抵抗。作者此意在意深文“9·11文学”的“前世”，在敲打出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之时，也奠定了将“9·11小说”置于恐怖与暴力这一漫长的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论述基调。相较之下，他在处理其“今生”时则略显保守了些，所选的文本从《恐怖分子》到《坠落的人》再到《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屈服》等，无一不是直接描摹恐怖袭击及其后续余波的经典小说。事实上，新世纪里的美国文坛既出现了许多对9·11事件的直接回应，也有大量像麦卡锡的《路》、罗斯的《反美阴谋》、品钦的《反抗时间》等居于光谱较远端的作品，它们虽未将镜头瞄准9·11事件，但读者依然能读出恐怖袭击的巨大阴影。因此，若有一两部并

在双塔倒塌的阴影下

蒋怡

非纯粹意义上的当代作品能入选本书的研究之列，或许更能勾勒出9·11事件的强辐射性及其文学叙事的更完整的面貌。毕竟，9·11是新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底色，它影响着更为久远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特性，我们无法绕过双塔倒塌的阴影去审视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

创伤与记忆是“9·11小说”被论及最多的话题，但是《跨越“归零地”》的论述重心在于寻求虚构叙事和理论在文化政治层面的建设性意义。基于包括“解离”“修通”等概念在内的创伤机制和认知科学研究，但汉松让记忆研究的众多学者展开对话，努力从德里罗、弗尔、麦凯恩等人的小说中建构出创伤叙事的积极意义，以虚构叙事联系当下生活经验，这体现了他身为人文学者对文学施为性的深深信仰和期待。

恐怖袭击造成了日常生活和自我的断裂，虚构小说在关注创伤体验和自我医治之时，也促使读者进行现实层面的反思：如此极端恐怖的暴力事件为何发生？我们要如何认识“他者”？如纳（Dwight Garner）曾撰文指出，当代美国小说表现出向先前被边缘化的声音开放的趋势，而“9·11小说”则使得“这一长期存在的趋势得以加速发展”。对此，《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和《恐怖分子》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汉松从人类学中汲取批评资源，挖掘这些小说中的他者暴力背后的深层原因。

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与他们”遭遇，那么我们对“他者”是否负有责任，又负有怎样的责任？作者将下一步探索的关键词锁定在“伦理”与“共情”上。他先是带着读者在理论思潮中遨游，从列维纳斯的无限他者和绝对责任，到德里达的好客与宽恕，再到哈贝马斯基于理性交往的共同体构想等等概念，只为寻找真正适用于解决“后9·11时代”里，“我们”与“他们”之间激烈冲突的可行性假设。基于这些理论铺垫，作者将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当作“9·11小说”中典型的伦理叙事来解读，探讨小说家如何将眼下的时代危机与美国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话语结合起来，呈现关于他者伦理的后现代崇高。“9·11小说”有着何种情感维度？它能否发挥文学的共情功能，提高公众面对他者的共情能力？作者以瓦尔德曼的小说《屈服》为例阐释共情的不确定性，他相信共情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意义，但同时提醒读者警惕“错误的共情”。

还有一类小说，是“后9·11时代”的战争书写。虽然这类小说并未直接描写9·11事件，但鉴于反恐战争是恐袭发生后美国长期的社会现实，不仅引发了虐囚案、非法监听等一系列丑闻，其本身也是帝国权力和霸权统治的另一种表达，所以它们往往让读者在反思战争之余，也更容易获得一种关于那次恐袭的批判立场。但汉松重点考察了三部战争小说，在横向上关注它们相对于其他9·11虚构叙事的关键性，在纵向上则将它们置于克莱恩、海明威、奥布莱恩等人的战争文学传统中，解读“后9·11时代”战争小说最为核心的艺术修辞和伦理关怀。

（作者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